

主持人语：发端于轴心时代的历史意识在时空中展开，并将地球上彼此分离的不同区域联结在一起。这一展开、联系的进程在 20 世纪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然而，历史也告诉我们，早在轴心时代，不同宗教之间就已经开始了彼此的互动、相互的影响。从整体出发，韩德教授的论文揭示了欧亚宗教自古就构成了的一个巨大网络。黎惠伦教授则从早期佛教和基督教两者间可能发生、存在的彼此影响，阐发了早期宗教文明对话的经验。陈剑光教授则从历史证据学和跨文化的视角，探讨了人们熟悉的莲花与万字符的象征意义，揭示了出乎人们意料的结论。赖品超教授从后殖民主义对东方学的批判进路，探讨了李提摩太对大乘佛教的回应，认为李提摩太对大乘佛教的理解比他同时代的人更能克服东方主义的种种流弊，为佛教和基督教的对话提供了更加可行的方向。而在当代诸宗教神学领域，佩里·施密特-洛伊克尔教授则以佛教和基督教的内部理论为起点，探讨了在全球化时代下佛教和基督教比较、对话和互益的新方法。纵观该栏目文章，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从轴心时代至今，佛教和基督教之间颇具活力的互动从未真正中断过，从而造就了今天世界上纷繁复杂的佛耶文明之对话与对话之文明，为当今时代佛教—基督教对话的文明建设开启了新篇章。

本栏目特约主持人：王志成 教授 [德]佩里·施密特-洛伊克尔 教授

一个早期的世界网络：欧亚宗教

[英] 韩 德

(考文垂大学 和平与和解研究中心，考文垂 CV1 5FB)

□ 李圆圆 译 王志成 审校

[摘 要] 横亘欧亚大陆大部分地区的宗教在公元前 4 000 年到公元 200 年间得到了创造性的蓬勃发展，这一时期的思想、艺术、实践得以集中共享。由于历史原因，存在于西方文化长廊末端的基督教与东方佛教之间的联系在大约 5—15 世纪间开始大量减少，15 世纪以后，这种关系进入了重建期。基督教和佛教这两种彼此“分离”的宗教看起来十分不同。尽管每种宗教都有其自身的历史，但就其本质而言，诸宗教之间则存在着许许多多的关联。信仰间的对话不是必须的，但欧亚宗教最好被视为一个错综复杂的网络，在这个网络里，制度化的“宗教”是这个复杂网络的服务器。宗教的“象征符号”可被视为某种类似于 DNA 解码序列的东西。

[关键词] 佛教；基督教；欧亚宗教

[收稿日期] 2009-12-05

[本刊网址·在线杂志] <http://www.journals.zju.edu.cn/soc>

[在线优先出版日期] 2010-04-30

[作者简介] 韩德，男，英国考文垂大学和平与和解研究中心亚洲研究部教授，主要从事亚洲宗教研究。

[译者与审校者简介] 译者：李圆圆，女，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宗教哲学研究；审校者：王志成，男，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跨文化宗教哲学、宗教对话、基督教神学研究。

An Early World-Wide Web: Religions of Eurasia

Alan Hunter

(Centre for Peace and Reconciliation Studies, Coventry University, Coventry CV1 5FB, U.K.)

Abstract : A rich, abundantly creative ocean of religiosity developed between 4000 BC and 200 AD across large areas of Eurasia. Ideas, art and practices were intensively shared. For historical reasons, contact between the Christianity of the Western end of the cultural corridor and Buddhism at the Eastern end was much reduced from about the 5th to the 15th centuries, and by the time contact was re-established, the two "separate" religions looked quite different to one another. Although every religion has its own history, in essence, there are so many connections between them. The inter-faith dialogue is unnecessary and Eurasian religion is best seen as an intricate web of which the currently institutionalised "religions" are "servers". The religious "symbol blocks" could be regarded as something akin to DNA coding blocks.

Key words : Buddhism ; Christianity ; religions of Eurasia

一、引言

亨廷顿关于诸文明之间的断层线的分析在中国和伊斯兰之间假设了一种反对西方价值观和基督教的联盟关系^[1]。许多学者也论证说,宗教既可能成为暴力冲突的源泉,也可能成为和平合作的原因^①。但也有些其他机构,如世界宗教和平协会,就对冲突的必然性产生了质疑。世界宗教和平协会主张,诸宗教共同体能够也应该成为 21 世纪重要的和平缔造者^②。许多人认为,让诸宗教成为 21 世纪重要的和平缔造者这一目标应该通过提升灵性,而非宣传教义来实现;应该通过对话和相互学习,而非拘泥于字义和福音主义来实现。

基督教世界已经是一种南方的,而非北方的主流宗教。就信仰人数而言,基督教将日益成为一种非西方的宗教;从南方,特别是从亚洲和非洲吸收要素是基督教重塑信仰的一个因素^[2]。同时,佛教在西方的迅速发展也使佛教成为一种在全球扩展的宗教。基督教和佛教的这些发展有助于它们在将来的相互交流中进行温和的接触,但这种增进的接触也可能为彼此间“共有历史”而非它们的“独有历史”的理解提供一个促进因素。

自公元 400 年起,佛教和基督教处于相互隔绝状态。查理·艾伦(Charles Allen)颇具说服力地指出,佛教共同体甚至在亚洲国家附近也几乎处于相互独立的发展状态,更不用说它们是否具有全球意识了。同时,基督教关于自身的早期发展始于非基督教的记忆也被早期教会完全摧毁了,之后,基督教在欧洲就频繁地被吸收进剥削的权力结构之中,并与这种剥削权力结构共生共长,再后来,基督教就成了帝国主义扩张中的欧洲霸权主义的核心要素^[3]。佛教和基督教这种不同的发展模式给人留下的刻板印象已被人们广泛接受了:佛教是由“佛陀”创建的一种亚洲宗教,宣扬一种无神论的或不可知论的理性信仰,佛教把业报、轮回和觉悟视为核心教义;基督教是由“耶稣基督”创建的一种西方一神论信仰,耶稣基督是来自巴勒斯坦的唯一救主。佛教和基督教都有许多(尽管不是全部)追随者发现他们自己的宗教显然是独特的。这些追随者的看法导致人们对优越性和排他性真理宣称的断然肯定,而这些优越性和排他性真理宣称在等级制度中也被强化和深化了。笔者

① 参见 <http://www.plowsharesproject.org/journal>, 2009-09-05。

② 参见 <http://www.wcrp.org>, 2009-09-05。

相信,宗教将来会在团结的,而不是分裂的理解基础上通过相互宽容而更好地起作用。本文要阐述的主要观点是:每种欧亚宗教在有限层面或表面上看都是独特的,但实质上,每种宗教都与其他宗教相互关联。虽然将关注点集中在宗教彼此间的差异性和区别性因素上是合理的,并且这实际上也是现代主流学派的核心目的,但这种独一的视角也会产生制约作用,并且可能使我们看不到值得注意的历史与文化的相似性。

二、信仰网络

至少从16世纪开始,来到亚洲的西方旅行者就开始认识到,在基督教与亚洲宗教,特别是与佛教之间存在惊人的相似之处。这些西方旅行者在态度上不是排斥其他宗教,就是对其他宗教感到好奇。例如,德国耶稣会士白乃心(Grueber)于1661年到达拉萨,曾记录下当地人给临终者施行涂油礼、为已婚的人祈福、庙宇的修建、举行宗教法事时的佛经唱诵等活动,另外,还有西藏僧侣经受最为严格的苦修,典型的如鞭笞,供奉上层僧侣以及遣返那些生活极端贫苦的僧侣,等等。罗马天主教会中的教士们较为典型的一个反应是:他们会争辩说,这些类似于罗马天主教廷的宗教实践以一种颠倒的方式通过魔鬼撒旦传给了亚洲人。另一个耶稣会士学者阿塔纳修斯·基歇尔(Athanasius Kircher)于1667年写道:“魔鬼的亵渎手段已经转移,因为魔鬼已经知晓了其他一切基督宗教的奥秘,理应归于罗马教皇,基督在尘世的唯一代理的尊敬被加诸在了异族充满迷信的崇拜之中。”^[3]

然而,在随后两个世纪的亚洲研究进展中,一代一代的学者致力于基督教正统信仰的研究,这样的研究使学者们很难注意到基督教与其他宗教之间存在的大量的相似性、巧合性和重叠性。比如印度教和佛教在图像、宗教实践、神话、智慧传统、哲学、服饰、建筑以及不计其数的其他领域内的相似性。19世纪兴起的两个重要学科,即埃及学和人类学为这一领域的研究注入了强大动力。古埃及学的代表是吉拉德·麻西(Gerald Massey),其作品在汤姆·哈波(Tom Harpur)2004年出版的一本书中被重新讨论。麻西的巅峰之作是在1907年出版的,最近在埃及再版为《古埃及:世界之光》^[4],麻西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埃及神话中的救世主和福音书中的耶稣之间的非常贴切的相似性。例如:明星启示降生;由一个后来被斩首的圣人施洗礼;在水面上行走;赶鬼,治病;山上变容、登山宝训;两个强盗之间的十字架;以及其他许多相似之处^[5]。包括詹姆士·弗雷泽(James Frazer)著名的《金枝》在内的19世纪人类学家的作品则进一步扩大了对这些主题的研究,并且显示出上述很多主题的广泛流传性,在某些文化领域几乎无处不在^[6]。

对西方人来说,最接近的相似性可能并没有出现在基督教与埃及或其他亚洲的异教膜拜团体之间,而是存在于基督教与佛教之间。著名的印度学家麦克斯·穆勒(Max Müller)在一个世纪之前曾经写道:“存在于佛教与基督教之间的那些惊人的巧合是不能被否认的,我们也必须承认佛教的产生比基督教至少要早400年。我甚至可以更进一步,如果有人能向我指出佛教影响早期基督教的历史渠道,我将感激不尽。我一生都在寻找这些佛教影响早期基督教的历史渠道,但迄今为止仍然没有找到。我所发现的最多的只是佛教和基督教之间存在的一些最为相似的巧合,这些巧合都有历史的先例,而我们一旦发现那些先例,这些巧合也就变得不再那么引人注目。如果我确实能在某些佛教教义文献中找到与基督教一致的东西,我绝不会感到害怕,相反,我会感到非常高兴,因为真理之所以是真的,是因为它对于人类种族的大部分群体来说是毋庸置疑的。”^[7]

那么,佛教影响基督教的历史渠道究竟有哪些呢?笔者认为这个问题本身在一开始就需要好好加以展开。自穆勒开始,特别是在过去的20年里,我们已经积累了一大批有关于具体的实物、文化实践、思想理论以及古代世界流行的知识,来自于语言学、考古学和遗传学等其他学科的信息也

大量涌入这一研究领域。运用这些新的数据,笔者认为穆勒的问题虽然是相关的,但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局限性。是的,佛教对基督教可能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如果你是坚持这一理论的,那么你就需要像穆勒所指出的那样找到佛教对基督教产生影响的“历史渠道”的证据。而事实上,也确实存在这样的证据,随后我们将看到。

但笔者宁愿这样说,现在存在着可称为“世界性的宗教网络”的证据,这个网络存于很多地方,若不是整个欧亚大陆,也是始于史前时代,并一直持续到公元500年左右。在笔者看来,这些数不尽的神话传说、实践、睿言智语、哲学思想、入教仪式、救世主等,很早就开始在大多数地方产生、兼并、发展、兴盛、衰落和重现。根据这些文本资料,我们可以了解基督教和佛教(印度教、摩尼教及其他宗教)都有它自己产生的时代,并成为欧亚宗教传统重要的局部体现。

由于多种原因,上述两种体现欧亚传统的特征渐渐通过文本的方式被制度化,并被记载下来。因为历史原因,存在于西方文化长廊末端的基督教与东方的佛教之间的联系大约从5—15世纪开始大量减少,从15世纪开始,两者间的联系进入了重建期。这两个“独特的”的宗教表面看起来是风马牛不相及,像两个成长在不同家庭里的同胞,住在相距甚远的两个城市中。但当他们长大成人再次相见时,却分辨不出两人的兄妹关系,仿佛是不认识的陌生人:差别是最重要的,与两者间的联系相比,差别显得更为突出。

因此,有些关于佛教影响基督教的讨论就显得过于简单化了,甚至会出现误导。比如,笔者发现这样的宣称是不可信的,即认为耶稣生活在印度,并在那里学习佛教^[8]。笔者也对汉森(Hasson)所举证的关于“耶稣是个佛教徒”^[9]这种论断的有效性表示怀疑,因为他看上去像是在用福音书中关于耶稣的历史作为自己论断的出发点。虽然笔者同意林德特勒(Lindtner)基于《新约圣经》和大乘佛教的梵文文献中的语言学和文化学分析的论断,即在格鲁吉亚的希腊文化世界中,将前面所提到的论断中的一些观点视为是对后面结论的解释,这种状况是很普遍的^[10]。但笔者所要提出来的观点要比林德特勒甚至更宽泛一些,即《新约圣经》的作者、佛教教义的作者以及基督教和佛教神圣传统的奠基者,都从植根于印度到巴勒斯坦甚至更远的地方的普遍宗教信仰中汲取了养分。笔者的核心论点是:纵观整个欧亚地区的文化,一系列宗教文本、观点和生命故事都归因于救世主,而他的明确形象也被赋予当地的文化特质。基于客观明确的证据,而非主观情感,笔者相信,就像不能说阿波罗(Apollo)或赫拉克勒斯(Heracles)创造了历史一样,我们也不能说是救世主(罗摩克里希那、佛陀、耶稣)创造了历史。即使有人能提供完全可信的证据,证明克里希那是一个在可靠的人物传记中被明确记录的真人,这一证据依然无法推翻前面的论断。这反倒像是说,从历史过渡到神话是存在着某种进程或发展的。

三、共有的传承

关于古代世界的讨论在过去十年中出现了一大批新的信息和连续性的理论,它们建立在考古学、语言学及遗传学等其他学科发展的基础上。这一部分将涉及如下问题:哪些是贯穿于欧亚间共有传统和连贯性的证据?哪些种族、地点和时间是尤为重要的?这一古代网络的物质基础是什么?至于这些问题对宗教信仰者来说所具有的意义,后文将会谈到。

当然,这些分支领域的任何一部分都能作为一个更为专业的领域,并暗含大量学术背景,所以,这一部分只是作简单的介绍。笔者将以戴蒙德(Diamond)有影响力的作品^[11]作为对这些非专业人士讨论的出发点,这部作品涵盖了最新的科学证据,显示了从新月沃土和埃及到横贯亚欧大陆的许多地方在公元前4000年至公元前1000年间的农业、手工业、城市、贸易、文字、管理结构的发展。戴蒙德强调了小麦、豆类及其他食物种类的培育,以及像牛、羊和马这样的牲畜的养殖所发挥的功

能。读者或许会很熟悉如下这个论断,即这种以农业为基础的体系会在很多地方繁荣兴盛,只要它们有近似的气候,就会很快在从西班牙到印度的整个地区快速扩展。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如谢拉特(Sherratt)将会提供更多关于这一话题的富有技术性的作品^[12]。

与此相关的其他研究领域是语言学和遗传学,它们都指出,欧亚大陆过去5000年间存在着很强的人口流动性和关联性,尽管其中很多是带有技术性的讨论,而且也会存有争议性,如原始印欧语的起源与扩展问题,原始印欧语后来发展成为梵语、希腊语、拉丁语和日耳曼语。来自贸易方面的证据显示,埃及和印度早在3000年前就已经有了广泛的贸易往来。截至公元前第四个千年的后半叶,宝青石在古代世界唯一的著名产地八达山(即现在的阿富汗东北部)以及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地区开始进行了贸易交换。到公元前第三个千年,这种贸易已经扩展到哈拉帕和位于印度河流域的摩亨佐·达罗。印度河流域也称美路哈,它是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苏美尔人和阿卡德人最早的水上贸易伙伴。

根据柯奥勒克(Ciolek)的记载,截至公元前1500年,欧亚的陆路和海洋交通线已经达到23000公里。回顾历史,据柯奥勒克估算,在第一个重要帝国——伟大的达利斯一世(公元前521年至公元前486年)时期,波斯人就已建立了一个卓有成效的交通系统,即通往西方的单独通道,长2500公里的“皇家路”。到罗马帝国早期,建设了一大批水路和陆路交通系统,它涵盖了整个地中海、北欧的部分地区及北非,一直延伸到印度甚至中国,而中国在那时已经拥有了自己的帝国通道。

漫长的古代充满了混乱和分裂,但至少有三个政治和文化的稳定期,分别是:大约公元前500年的波斯王国;著名的亚历山大帝国(公元前300年),帝国的扩张极大方便了希腊人与印度人间更密切的交往;以及罗马帝国,其最兴盛的时期当在公元50年左右。

简而言之,各种证据表明,从中国到西班牙和北非连结成了一个世界性网络链:第一个世界性网络是从北非到中国的极具流动性和关联性的社会网络联合体。当然,这一网络在不同时期存在不同的“重力中心”(服务器),有时候它们位于像亚历山大或耶路撒冷,罗马或雅典,巴比伦或巴格达这样的大都市,但这个网络本身在历经不同的“重力中心”后依然存在。很少会有永恒的交往障碍,相反,却存在许许多多的文化传承——农业的、实践的、音乐的、数学的、天文学的、神话的传承。

对于这些民族,我们有很多分类和区分的方法,比如按种族、共有的文化、共同的领土、政治组织进行分类。宽泛地说,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将上述所有内容作为分类依据。其中主要的组成民族是:(1)说闪族人语言或美索不达米亚语言的阿卡德人,以及说西南亚同源语言的民族,所谓的西南亚或许是指现代的巴基斯坦到埃及和沙特阿拉伯的地区,这些地区的许多人都在说着一种变化了的闪族语;(2)说印度—欧洲语言(印度语、希腊语、罗马语、日耳曼语)的民族;(3)从属于汉藏语系的民族(主要是在中国);(4)从属于伊朗、土耳其和中亚语系的民族,从波斯普鲁斯到遥远的中国西部边境。

上述所有民族都分享同一个主要以农业为基础的物质文化传统,它始于公元前9000年,以小麦的第一次培育为标志,将小麦作为对渔业和捕猎的补充。到公元前4000年为止,我们看见了第一个固定农场的建立以及早期的城市安居地,使用金属工具进行劳动,贸易和手工艺的发展,管理体制和领土、社会管理的出现。

四、宗教的相互作用

在生活的其他方面出现了这么多关于各宗教间紧密联系的证据,实际上,如果一个地区的宗教信仰完全脱离于其他地区而独立发展,这实在令人奇怪。事实上,正如我们所期盼的那样,存在着大量的证据,虽然并不一定是完全同类的,至少它们表明有数不清的宗教信条和实践在北非和印

度,甚至更远的地方传播开来。在诸如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巴勒斯坦、希腊、波斯和印度这样伟大的文明间覆盖着一个错综复杂的宗教网络。当然证据也是残缺不全的,一部分是因为时间的久远;一部分原因是许多宗教是通过口授的方式传播的,有时是私人性的甚至是秘密进行的;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几次对于异教徒的故意迫害。

不过,也有一些无可辩驳的例子:在希腊早期诗篇中出现了很多西亚的神话和类似的主题^[13];同样,也有北非对克里特的米诺安文化产生的影响;以及麦克维利(McEvilley)所描述的在波斯统治下的希腊与印度之间畅通发达的联系^{[13]6-12},这一紧密联系于公元前545年至公元前490年间促使了轮回、素食主义和神秘的数字命理学,以及美索不达米亚的毕达哥拉斯派的数学的出现。或许最为重要的是哲学思想,我们可以看到唯心主义哲学家广泛深入的隐喻,比如,神圣的灵魂会在物质世界中迷失。

在古希腊罗马时期,宗教联系的内容更加深入,并且也被很好地记录在案。最开始是亚历山大时期,然后罗马统治者通过殖民地、远征、军队、海路、艺术和翻译组建了一个从埃及到印度的统一“世界”。阿育王的佛教使团来到了西方,其中至少有一位是著名的佛教使者法护(Dharmaraksita),而他本人就是希腊人。后来,在希腊化文化或罗马文化中出现的神秘主义运动用当时流行的哲学思想整合了来自于埃及和西亚的惯行的宗教仪式。普罗提诺(Plotinus)和新普罗提诺主义哲学家似乎也特别熟悉印度冥想传统和曼陀罗。

(一) 关键的宗教传承之一: 道成肉身

许多宗教学家、人类学家、埃及学家、古典主义者及其他学者都曾指出,在亚欧文化中存在一个普遍的传统,即救世主都化为人的形象或者至少要作为一个带有某些人类特征的特殊形象出现,如何露斯(Horus)、奥西里斯(Osiris)、狄奥尼索斯(Dionysus)、埃提克(Attic)、阿多尼斯(Adonis)、密特拉(Mithras)、克里希那(Krishna)和佛陀(Buddha)等一些神。这些神以广泛流行于文化领域的神话虚构的方式表现出来:冬至出生,以神为父、以处女为母,奇异莫辨的童年,打败撒旦,施行奇迹,遭致当地精英反对,钉于十字架,打下地狱,死而复生,再次升天。德累特(Derrett)提到的一个有趣的例子是,佛陀的法身、报身、应身三身与基督的圣父—圣子—圣灵间存在相似之处^[14];林德特勒提到了“tri-ratna”(三宝)到“trinitaria”(三位一体)的一个可能的几何学转换的观点,这一观点也被其他学者所采纳^[10]。

(二) 关键的宗教传承之二: 宗教仪式和践行

我们也会发现这些宗教仪式、组织机构和其他的宗教践行都同样广为流传。洗礼是作为记录在金字塔文本里的埃及宗教的一个特征,也是希腊埃勒夫西斯秘仪(Eleusis Mysteries)的特征^[15]。不需要引用太多的细节,就能找出很多相同点,如圣餐(密斯拉神和迪奥尼索斯的宗教崇拜)、解救地狱中的灵魂的超度、僧袍、剃度出家、摇铃、有穹顶的巴西里卡式教堂、忏悔、舍利崇拜、念珠、独身、念咒及烧香,所有这些仪式现仍在欧亚大陆盛行。

(三) 关键的宗教传承之三: 暗喻和天职

另一个相似点是宗教教化层级的划分,这一划分可以对信仰者因材施教,各得其所。众所周知,从非洲到印度广泛流传着一系列真正具有启思性的宗教隐喻,它们以寓言的方式为那些未受过教育或刚刚接触宗教、此前对之一无所知的人提供了简单易懂的信息。具体来说,就是通过诸如使用熟悉的动物、农业生产活动、家庭和社会关系等方式,启迪信奉者对诚实、勤劳工作、相互帮助等良好品质的认识^[14,16]。

但人们也认识到,许多文本和特定的口授传统所蕴含的大量精神性启迪仅仅对那些已经入教的人士才会发生作用。许多这样的文本是通过理解他们的数字命理学及其含义而获得意义的,比如早些时候所提及的测地术。《马可福音》中记载:“我掰开那5个饼分给5000人,你们收拾的零碎装满了多少篮子呢?他们说,12个。”《约翰福音》中记载了西门和彼得在主耶稣的指引下一网打捞出153条鱼的神奇故事。这两个故事的来源可能都是古老的算术学,只不过这一学科已离我们太远。当然,这神圣的数学在埃及、希腊及整个犹太传统中是最平常的。

暗喻和隐意是一些宗教传统特别重要的组成部分,具体来说有:努力转变别人信仰的冲动、福音传道或施行天职。当然,并不是所有宗教都是这样的,正确地说,这主要是佛教和基督教的关键特质。在这两个宗教的历史故事背后暗含深刻的启示意义,因为它们所宣扬的暗喻和隐意是传播最广且为人熟知的,尤其是对于基督教来说,在这方面具有最为积极主动的和组织完善的宗教信仰体系。

(四) 关键的宗教传承之四：灵性与道德规范

一些基督教信仰者尤其是诺替斯教派所表达的基本的灵性观和唯心主义哲学观,与印度人和希腊人所传达的灵性观基本上是相同的^[17]。伦理和道德律令(宽恕、仁慈、诚实、谦虚等)在亚欧与中国的哲学中以及那一时期的宗教中是极为普遍的。举例来说,《法句经》和耶稣的登山宝训之间有很多较特别的相似。汉森归纳了耶稣和佛陀之间一些相似的说法^[9,18]:

耶稣说:“忏悔你的罪,为他人祈祷,这样你会得到拯救。”

佛陀说:“在世界面前承认你的罪。”

耶稣说:“通过他的血我们拯救了他,就原谅他所有的罪恶吧。”

佛陀说:“让世界上所有的罪恶都降临于我吧,这样世界将会得以拯救。”

耶稣说:“按照你想别人对待你的方式去对待他人。”

佛陀说:“像对待你自己一样对待他人。”

耶稣说:“如果有人打了你的右颊,你把左颊也转给他。”

佛陀说:“如果有人用手、木棍或一把刀袭击你,你应该抛弃所有恶念并且一声不言。”

(五) 关键的宗教传承之五

最后,不同欧亚文化中的宗教艺术和图像之间存在着惊人的相似。像十字架和鱼这样的符号象征广为流行,毋庸置疑,不同的部分都具有不同的表征意义。比如,十字架的象征意义就可以解释为一个神秘的几何标志,它象征着神性对物质世界的渗透;十字架也代表着耶稣被钉在了十字架上,上面的动物,如羊,被描述为代人类赎罪的替罪羊;当然,十字架也象征着受尽折磨的救世主通往地狱之城的轨迹。同样是以神秘几何图形表现出来的鱼,象征着两个圆中的一个穿过另一个的圆心连结成的图案。一些特定的“高贵的野兽”,如雄鹰和公牛,也会被宗教所利用,它们将被进行奇妙的联合。

或许在雕塑中,文化间的这种融合特征显得最为突出,尤其是著名“佛陀”的犍陀罗雕像,它在如今的白沙瓦地区得以长期流传。我们所熟知的“希腊风格的佛教雕像艺术”也可能受到来自叙利亚、波斯和印度的影响,这些雕像融合产生了一个以清静、至高无上、理想化的人为范型的佛陀的独特形象;带有典型的雅典雕塑的静穆特性,在现在的宗教系统中却传播了数千公里,一直传到东方。希腊文化的影响,尤其是这种以男性为摹本的拟人型的神的形象,则直接传播到印度东部,并沿着

东方的丝绸之路直到今天的新疆地区。当然,希腊雕塑的起源问题本身也是错综复杂的,最终有可能也是源于埃及甚至美索不达米亚地区,而这就是文化网络的另一个例子了。

五、克里希那、佛陀和耶稣

笔者将克里希那、佛陀和耶稣这三个形象作为“神圣传记”最重要的代表,他们分别代表着现代印度教、佛教和基督教的创立者,并且他们的生活和教化经历有许多相似点。

关于克里希那、佛陀和耶稣的文献记载日期和可信性,或其中的文字内容,是一个极具技术性和争议性的话题,这一话题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一直是专家们讨论的核心。不足为奇的是,与宗教研究相关的学者(尤其是保守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都倾向于认为这三个神各自的文本记载与自己作为救世主的一生经历是息息相关的,多少也都有可信性和真实性。那些出于各种原因(学术的、情感的、政治的、宗教的或商业的)质疑宗教文本真实性的学者倾向于认为,这些文本是在很多年之后,由不知名的人所写的带有象征性和歪曲性内容的东西。

笔者对这一证据是这样解读的,克里希那的生命故事(或其他演化的版本)是非历史性的,而且即使那些虔诚的克里希那主义者接受这些论点也是没有困难的,就像接受罗摩一样。《奥义书》、《谟哈巴拉特传》、《吉踏经》、《罗摩传》以及所有早期的印度手抄本记述的日期事实上都是非常不确定的,有时甚至是很多世纪以前的。克里希那是作为一种灵性和一个神被崇拜,它是一个中心、一种颂语或一个精神事件,而并不一定是历史中的真实人物。

佛陀离我们的时代虽然并不遥远,但他的生活和教化经历对我们而言也不可能是完全真实可信的。基于任何科学的证据,这些观点是不堪一击的,即将佛陀出现的确切时间追溯到公元前5世纪,或者把大乘佛教经典作品都确切地归属于佛陀。笔者同意德累特的观点,即任何大乘佛教的经典著作(与基督教有着最接近的相似点)的产生都不可能早于公元1世纪,也不可能在接下来的3个世纪会得到持续的发展。最早被人们知道的巴利文教义是产生于大约公元前1世纪的“佛陀的教导”,虽然仍有迹象表明它是对源于北印度的一个更早的口述传统的记载。而西方的非佛教主义的学者至少倾向于怀疑任何被划归到“佛陀”的文字记载。

关于耶稣的历史同样具有不确定性和争议。这样说或许是对的,即保罗书信是现在的《新约全书》最早的记述,但这一说法本身或是众所周知的,或是臭名昭著的,在这些已被证实的文字记载中却对耶稣在巴勒斯坦的生活与传道经历只字未提。《圣经》的福音书以及大部分非福音书部分的日期都是不确定的,可能是由那些不知名的人用希腊语在他们所要着意表达的事件发生的数年之后编写和收集的。《新约全书》的其他正篇如《使徒行传》和《启示录》部分的来源更为模糊。批评家们在这些记述中列出了很多内在的不一致,举例来说,一些批评家认为,这些福音书的编撰者是不可能对巴勒斯坦或其地理方面的知识的。马可和其他福音书的作者所做的纯粹是一种文献的转换。

我们可以这样说,克里希那、佛陀、耶稣这三个典型形象是将救世主的“网络模板”运用到这三种重要文明中的结果:克里希那这一形象源自印度一个民间/军事英雄;佛陀这个喜马拉雅—宇宙圣人形象则是人们把北印度的禁欲主义和非禁欲主义传统结合起来的产物;耶稣的形象则是将救世主的形象与罗马人/犹太人的情节剧相结合形成的。

在笔者看来,这种分析可能会提出一个具有偶然性的论断:耶稣(或佛陀)一定是实存的历史人物,否则不可能有以他们的名义出现的这么大的机构和运动。笔者认为,很少有学者会对将罗摩、克里希那及老子作为宗教想象的产物而非历史人物这样的主张有争议,而且印度教和道教在过去几个世纪里有大量的信徒。历史的严谨性乍看起来可能会对一些传统的精神性形象产生威胁,但

即使是像汤姆·哈波那样虔诚的信徒也会承认，“摘引耶稣故事的文献并杜撰出一个耶稣故事之外的虚构的历史”^[5]^[179]，实际上是在贬低其宗教真正的精神意义；耶稣的生活故事如同其他救世主一样，都是一种对人类觉悟深层因素的戏剧性展现。

六、分离性

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如果真的存在宗教间的相似点，为什么彼此竞争的宗教间还会出现分离？但不幸的是，这一问题是一篇论文的主题。这里可能有两个答案：一是罗马帝国迁往拜占庭后的衰败，以及极端严酷的基督教正统教义的采纳^[5]。这就意味着在基督教信仰体系中非基督教信仰的破坏或衰落，以及不断减少的与自己宗教之外的非基督教信仰代表的合作。随后由于没有了统一的帝国或霸权，他们不能像以前一样促进各民族通过欧亚大陆进行自由的活动与交流合作，尽管这些民族在波斯和亚历山大时代所使用的仅是较为原始的技术。二是丝绸之路实质性的中断，而它的“伊斯兰化”真正始于17世纪，这也是它自身非常重要的研究领域^[19]。三是西方帝国里教堂的制度化，这导致了对非基督教信徒频繁的集体迫害，图书馆的破坏，以及对其他所有信仰的禁止^[15]。

同时，在亚洲，佛教的延续主要归功于孜孜不倦的中国译者和僧人，他们把佛教带入中国继而传入日本、朝鲜和其他东亚和东南亚国家。而类似于佛教在亚洲各国间的这种广泛传播，西方国家直到16世纪或更晚一些才发生。由于多种原因，佛教在当代的阿富汗、巴基斯坦以及中亚地区较早期的西方要塞实际上已经消亡了。

七、结 论

本文的主要观点是，横亘欧亚大陆大部分地区的宗教在公元前4000年到公元200年间得以创造性地蓬勃发展。思想、艺术、实践都被广泛地分享，并具体化在各种宗教运动和组织中。佛陀、克里希那和耶稣可能既不是历史人物，也不是由他们的“传记”塑造出来的，而是神话的或精神的。

在此分析中有一种与“内部—信仰—对话”一致的、有趣的或极具蛊惑性的挑战。笔者甚至认为“内部—信仰—对话”的存在是不必要的，或者毋宁说这是一种误称。欧亚宗教最好被看成是一个错综复杂的网络，在这个网络里，制度化的宗教是它的服务器，这种服务器通过各种方式已被预先程序化：其中有些方式是令人惊叹的，但也有一些是具有破坏性的。我们会说，其中的一些程序已经感染了木马病毒。另一种类比是，宗教“符号组”可以看做是类似于DNA的解码序列^①，但同样也是会遭遇病毒的，这些宗教“符号组”甚至会转化成破坏和自我破坏的模式，但也会转变为令人惊叹的和相互合作的模式。

因此，在笔者看来，在人类精神生活中，通向合作道路的最好起点是解构人类历史，尤其是人类的不宽容历史。当另一个人分享了与自己相同的基本信条时，自己为什么一定要屈从于他来进行转变？转变可以使人重获“一个更深入的精神生活”的初始缘由，而不是劝服另一个人去改变他（她）自己的信仰。因此，“内部—信仰—对话”并不存在于两种不同的世界观之间，这两种世界观先验地将彼此区分开来。在笔者看来，以此为基础的对话似乎是不需要的，也是注定会失败的，并可能注定会产生一些局限性的后果。而这种对话本身反而更像是在寻求一种健康

^① 这一观点是香港中文大学陈剑光先生提出来的，笔者在此非常感谢他在阅读了本文草稿后所作的极富建设性的建议。

的 DNA。

有关宗教和解研究的一个内容是,搭建一个彼此间“共有的历史”,而不是建立一个基于仇恨和误解循环的彼此分离的“独有历史”;另一个内容是构建一个可以共享的未来。因此,本文的观点是,避免成为一种对诚实产生威胁的因素,承认共有传承对自我理解和进行信仰间对话有着积极贡献。

[参 考 文 献]

- [1] S.P.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6.
- [2] A.Hunter & K.K.Chan, *Protestantism in Contemporary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 [3] C.Allen, *The Buddha and the Sahibs: The Men Who Discovered India's Lost Religion*, London: John Murray, 2002.
- [4] G.Massey, *Ancient Egypt, the Light of the World: A Work of Reclamation and Restitution in Twelve Books*, London & New York: Kegan Paul, 2004.
- [5] T.Harpur, *The Pagan Christ: Recovering the Lost Light*, Toronto: Thomas Allen Publishers, 2004.
- [6] J.G.Frazer & R.Fraser, *The Golden Bough: A Study in Magic and Relig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 [7] F.M.Müller, *India: What Can It Teach Us?* New York: J.W.Lovell Company, 1883.
- [8] F.M.Hassnain & D.Levi, et al, *The Fifth Gospel: New Evidence from the Tibetan, Sanskrit, Arabic, Persian, and Urdu Sources about the Historical Life of Jesus Christ after the Crucifixion*, Nevada City: Blue Dolphin Publishing, 2006.
- [9] J.M.Hanson, "Was Jesus A Buddhist?" *Buddhist-Christian Studies*, No.25(2005), pp.75-89.
- [10] C.Lindtner, "Geomatria in the Gospels," *Acta Orientalia*, No.64(2003), pp.7-38.
- [11] J.M.Diamond, *Guns, Germs, and Steel: The Fates of Human Societies*, New York: Norton, 2005.
- [12] A.Sherratt, *Economy and Society in Prehistoric Europe: Changing Perspectives*,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97.
- [13] T.McEvilley, *The Shape of Ancient Thought: Comparative Studies in Greek and Indian Philosophies*, New York: Allworth Press & School of Visual Arts, 2002.
- [14] J.D.M.Derrett, *Two Masters: The Buddha and Jesus*, Northamptonshire: Pilkington Press, 1995.
- [15] T.Freke & P.Gandy, *The Jesus Mysteries: Was the "Original Jesus" a Pagan God?* New York: Harmony Books, 2000.
- [16] J.D.M.Derrett, *The Bible and the Buddhists*, Sardini: Casa Editrice, 2000.
- [17] R.T.Wallis & J.Bregman, *Neoplatonism and Gnosticism*,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2.
- [18] M.J.Borg & R.Riegert, *Jesus and Buddha: The Parallel Sayings*, Berkeley: Ulysses Press, 1997.
- [19] R.Foltz, *Religions of the Silk Road: Overland Trade and Cultural Exchange from Antiquity to the Fifteenth Century*, New York: St.Martin's Press, 1999.